



两汉卷

尚学锋 著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漢室草創，天下兵火未息，社會政治經濟之嚴重。後漢章帝時賢哲之神，高皇之大統也。一朝皆已歸楚矣。於是何復不之慕也！一後漢則復起。既復起，有其人名焉。常臺以「離云名都」，常侍以「守是浮丘不思歡娛」，自古詩曰：「一日放山雨霽晴，醉不到兮醉不還。」既不醉兮可奈何？一後漢陳子季游於漢上，數舉酒，其人醉之，酒主送錢行酒，其人不受，至晚醉而還。



安徽教育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两汉卷

尚学锋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两汉卷 / 尚学锋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336 - 7187 - 7

I. ①中… II. ①尚…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中国—汉代 IV. ①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858 号

书名:中国散文通史·两汉卷

作者:尚学锋

出版人:朱智润 策划统筹:张丹飞 张 利 责任编辑:张艺文
版式设计:朱 锦 装帧设计:张鑫坤 技术编辑: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51)6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20×1010 1/16

印张:20.5

字数:295 千字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6 - 7187 - 7 本卷定价:118.00 元(全套定价:149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汉代散文的时代特征	001
第二节 汉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007
第一章 汉代论说文	016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论说文	016
第二节 西汉中期的论说文	035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论说文	041
第四节 东汉前期的论说文	044
第五节 东汉后期的论说文	052
第二章 汉代奏议文	061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奏议文	061
第二节 西汉中期的奏议文	072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奏议文	087
第四节 东汉前期的奏议文	096
第五节 东汉后期的奏议文	101
第三章 汉代史传文	108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一家之言	108
第二节 《史记》的散文成就	123
第三节 班固与《汉书》的思想特征	138
第四节 《汉书》的写作特点	150
第五节 汉代其他史传文	155

第四章 汉代体物赋	156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体物赋	156
第二节 西汉中期的体物赋	160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体物赋	167
第四节 东汉前期的体物赋	172
第五节 东汉后期的体物赋	179
第五章 汉代抒情赋	185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抒情赋	185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抒情赋	191
第四节 东汉前期的抒情赋	198
第五节 东汉后期的抒情赋	201
第六章 汉代赋体杂文	210
第一节 西汉问对之文	211
第二节 东汉问对之文	226
第三节 其他赋体杂文	232
第七章 汉代礼制之文	236
第一节 汉代颂文	237
第二节 汉代铭文	250
第三节 汉代箴文	257
第四节 汉代诔文	261
第五节 汉代碑文	267
第八章 汉代书牍	275
第一节 西汉的书牍	275

第二节 东汉前期的书牍	284
第三节 东汉后期的书牍	289
第九章 汉代序文	302
第一节 西汉序文	302
第二节 东汉序文	312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 记	321

目

录

绪 论

第一节 汉代散文的时代特征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代的历史天空，风起云涌，格外壮丽。中国的散文发展到汉代也揭开了辉煌的篇章。前人说，文必秦汉，先秦和汉代是中国散文的两座高峰。但和先秦相比，汉代散文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汉代散文具有盛世之文的特点。两汉时期从总体上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盛世。称之为盛世，是由于它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国家统一，疆域辽阔。从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 220 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两汉历时四百余年。其间虽经历了王莽后期及汉末的动乱，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国家是统一安定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长期困扰中国的匈奴威胁被解除了，其它周边地区也得到了开发，汉朝以辽阔的疆域，雄张的国力出现于世界的东方。

其次是国家繁荣富裕，文明程度大大提高。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物质财富持续增长，文化建设盛况空前。

再次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汉代为各种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人才出现的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另外是中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生活。

两汉的盛世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富裕

而强盛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一种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人们踔厉风发,积极进取,崇尚名节,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有一种雄骏豪迈的气概。这种时代精神赋予汉代散文浑厚朴拙、奇肆雄健的审美特征,使其充满气势和激情。在中国散文史上,汉代的散文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活力四射,令人过目难忘。

汉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社会普遍追求娱乐的风气,散体大赋就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统治者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搜集和整理图书。例如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使得“天下铁闻旧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司马迁《报任安书》),写成《史记》一书,正是当时大规模进行文化建设的产物。

汉代散文不同于先秦散文的另一个地方,是经学对它的影响。汉武帝时从两个方面提倡经学:一是确立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张仪、苏秦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王先谦认为当在建元元年)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一建议得到了汉武帝认可。此后儒家学说被作为施政和言行的准则。二是建立制度和机构,培养选拔通经之士。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五十名,后经考试合格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其他官吏升迁也以通经为标准。公孙弘以儒学由布衣而为丞相,封平津侯,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述举措使经学超越了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成为政治运作的工具,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提倡经学,儒家的价值观成

为全社会共同信奉的准则,这对于维系社会的稳定乃至形成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以经学取士在全社会形成了读经和重视文化的风气,官吏队伍的成分大大改观,从此“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卷八十八《儒林列传》)。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文学的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基础,此外,经学思想、经学的阐释和授受方式都对文人的思想、生活、士林风尚以及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经学之外,礼制建设对汉代散文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西汉初年,百废待兴,朝廷尚未进行大规模的礼制建设,刘邦虽让叔孙通定朝仪,但其他方面的礼制建设并未全面展开,更没有把礼制与文章结合起来。武帝时期开始大兴礼乐,最重要的代表性事件是举行封禅大典,司马相如为此作了《封禅文》,标志着汉代的礼制和文章开始结合。西汉后期,礼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相关的各体文章也逐渐活跃。扬雄作《赵充国颂》、《元后诔》和《十二州箴》,在新莽时期又作《剧秦美新》,开了东汉时期礼制之文的先声。东汉建立之后,随着朝廷大力进行礼乐建设,此类文章便蓬勃发展起来。据《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载,“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义,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张纯在光武帝支持下制定了禘、祫之礼。刘秀后期,又去泰山行封禅之礼。明帝时更为重视礼制建设。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履以行事。礼毕,登灵台”。(《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三月,明帝“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后汉书·礼仪志》)“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章帝时,进一步制礼作乐,据《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载,“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

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族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讞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后章帝逝世，曹褒所作《汉礼》被搁置不行。

与此同时，朝廷大力提倡礼文的制作。刘秀封禅泰山的刻石，即是一篇封禅专用的礼文。刘秀还令文人为当时的将相作诔，据《后汉书》卷八十《文苑列传》载，杜笃曾因事下狱，“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明帝时，礼文的制作更为兴盛。明帝多次巡狩，都有大臣为之作颂。宫中出现神雀降集，明帝令百官作《神雀颂》。他还令贾逵为东平王刘苍的《光武受命中兴颂》作训诂。章帝之时，继续提倡颂文的写作，崔骃写《四巡颂》称颂汉德，受到章帝赏识。傅毅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追美汉明帝之功德，文雅显于朝廷。在朝廷的倡导下，颂文大兴，与此相关的铭、诔、碑等文章也繁盛一时，这种情况是战国时期所未见的。

汉代史学的成就也非常可观。西汉时期，司马迁继承父志，写成《史记》，在他之后，续作者层出不穷。东汉时期，朝廷对修史极为重视，专门设立东观等机构，招集文人在其中编撰史书。这一时期的史书修撰也被纳入礼乐建设的范围，发挥着纪功颂德的功用。明帝曾向东平王刘苍宣示所作《光武本纪》，此文或许就是班固等人所写的《世祖本纪》，据《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而下狱，“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一篇本纪竟然需要数人共同完成，可见它在朝廷心目中的重要性。明帝以后，东观成为朝廷的主要藏书之处，进入东观的文人兼具校订典籍、撰述史传及礼文的职能。东汉的著名文人，大都有在东观任职的经历，很多人曾奉命修史。据《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初，临邑侯（刘）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駘、騤及

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骃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安帝时，谏议大夫李尤也曾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一起撰《汉记》。东汉后期，高彪、延笃、朱穆、边韶、蔡邕、卢植、韩说等均曾著作东观，邕与卢植、韩说一起撰写《后汉记》。撰史的风气不仅造成史传文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碑、诔、铭等文体的发展。东汉后期，碑诔盛行，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说：“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又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东汉时期的诔、碑、铭等文体前面往往有一篇散体长序，用以序事，刘勰认为它颇似传体，究其来源，实为史传文的影响。^①

两汉的散文呈现出日益浓厚的文学意识和审美追求。这一时期，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带有文学性的文章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文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文章之士，在人们心目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何之等以儒术进身的人有明显的区别。汉代的某些帝王及贵族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形成了一些文学创作中心和较早的文人集团。在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号为“八公”的文人；梁孝王刘武门下聚集了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汉武帝、汉宣帝的宫廷里更是文人云集，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王褒、刘向、张子侨、华龙等作家都先后受到任用。这些文人在一起同气相求，交流切磋，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喜爱文章辞赋成为一时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创作的人。例如辞赋家司马相如，景帝时曾任郎官，但对仕途不感兴趣，辞官不做，听说梁孝王喜爱文学，便投其门下，与当时著名文人枚乘、邹阳等人交往，后来因创作《子虚赋》受到武帝赏识。《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列

^① 东汉的某些碑文，实为史家受诏而作，例如《后汉书·窦章传》所载：“顺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在这种情况下，碑文具有史官记事的性质就非常自然了。

中国散文通史 · 两汉卷

传》外另立《文苑列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可见作家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两汉时期，人们更加重视文章的审美功能，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葛洪《西京杂记》引）；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并把它比作“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能够“虞悦耳目”（《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冬王贾传》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辞赋形式美的特点。汉宣帝推崇辞赋的审美功能，肯定其“虞悦耳目”的作用。由于社会的广泛喜爱和当权者的提倡，汉代辞赋盛况空前，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些用以抒情、议论的赋体杂文乃至游戏之作。汉代散文在应用之外开拓了审美的疆域，这是此前的战国散文所少见的。在辞赋的影响下，汉代的散文越来越讲究形式美，对偶的成分日益增多，到了东汉后期，出现了几乎通篇对偶的文章。这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

第二节 汉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四百年间，两汉的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几经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 西汉前期(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 206—前 141)

汉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朝廷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这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各种学说得以并存。诸侯国的存在也使文人在仕于朝廷之外另有效力于藩国的出路，先秦的游士之风依然盛行。此期的散文作者或身处朝廷，或栖身藩国，他们的文章都带有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的特点。

朝廷作者的文章以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治国方略为主，这类文章是从刘邦的提倡开始的。刘邦做皇帝后，早年不喜读书、好侮慢儒生的行为有所改变。据《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载：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安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祖不怿，有慚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刘邦不仅鼓励大臣发表政见，而且下诏求贤。其《求贤诏》云：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下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

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全汉文》卷一）

他在去世前几个月，在平定英布回朝的途中，特意绕道曲阜，以太牢祠孔子。在临终前，他手敕太子，其中说：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同上）

刘邦这些言行，表现出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取向；在他之后，文景二帝继续坚持了这种取向，而且在实行黄老之治的前提下，开始容纳儒家学说^①。在这样的背景下，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等作者先后著文发表政见。朝廷之文盛于一时。

与此同时，吴王、梁王、淮南王等诸侯王大力招揽文士，一些聚集于其门下的文人如邹阳、枚乘之属上书言事，其文章带有浓厚的纵横游说之风。而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共同著成《淮南子》一书，则成为汉代前期散文创作的盛举。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诸侯王的鼓励下，文人们开始创作辞赋，汉代的辞赋就在这时走向了成熟。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强化，藩国作者的创作也就渐渐消歇了。

（二）西汉中期（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74）

汉武帝时期，国家的实力达到强盛的顶点。汉武帝外征四夷，开疆拓土，对内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空前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同时又求贤若渴。《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其元封五年《求贤诏》云：

^① 据赵岐《孟子题辞》：“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可知其时已有《五经》和传记博士，《诗经》学者韩婴即于此时为博士。文帝又欲征《尚书》学者伏生，伏生老，不能行，于是派掌故晁错往受之（事见《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景帝时，齐《诗》学者辕固、《春秋》学者胡母生、董仲舒均为博士，鲁《诗》学者王臧为太子少傅。可见儒学已逐渐受到重视。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蹶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卷六《武帝纪》）

由于汉武帝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当时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局面，其中包括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朱买臣、严安、徐乐、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一大批作者，散文创作在此时盛况空前。

汉武帝在位时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提倡经学。武帝即位时，正值年富力强。他雄心勃勃，不满足于文景时期已取得的成就，希望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为此，他不再像前辈那样仅仅去借鉴亡秦的教训，而是要探讨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想从天道的角度了解治乱兴衰之迹，以便找到一种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他在征询贤良文学对策的诏书中即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隽，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少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汉武帝考察了三代以来的历史,对治乱兴衰之迹深感迷惑。自东周以来的数百年间为何大乱不止?那些“守文之君、当涂之士”为何无法挽救世道的衰微?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未为人知的深层动因?人类的行为如何与天道相协调从而获得更大的合理性?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寻找一种符合理想精神的理论作为现实政治的原则,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政治境界。“岂其所操或悖谬而失其统”即探询以何种“道”进行治理才能上承三代之统,获得上天之命。总之,汉武帝希望找到一种永恒的“道”、一种超越具体方法和策略的形而上的精神或原理,作为处理各种现实关系的准则。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针对汉武帝急于求治的心理,及时地提出了“更化”、行王道、崇儒学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汉代的政治思想于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与此同时,汉武帝要求臣下写文章及发表议论也以儒家学说为准,他在给严助的诏书中明确要求对方“俱以《春秋》对,毋以苏、张纵横”(《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在这一导向之下,汉代的文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以董仲舒《天人三策》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经学色彩的文章。这种文章成为西汉后期散文的主流。

汉武帝既盛武功,又长于为文,颇有创作。他尤其喜爱辞赋,即位之后,把当时的著名赋家枚皋、司马相如等人招至朝廷,鼓励他们创作。自此以后,汉赋的创作中心由藩国转向朝廷,其内容与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武帝之后的昭、宣两朝,注意缓解武帝时期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政治较为稳定。此期的散文大体沿着武帝时期的方向发展。宣帝喜爱辞赋,辞赋创作仍然盛极一时。

(三)西汉后期及王莽时期(元帝初元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前48—23)^①

元帝以后,政治开始走下坡路,皇帝腐败,外戚专权,最终导致了王莽

^① 王莽建立了新朝,已不属于西汉。但新朝历时短暂,其时的作者皆来自西汉后期,故本书将新朝的散文置于西汉后期一并论述。

代汉。这个时期的皇帝都喜爱经学，儒家学说真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面前，一些经学之士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向当权者进言，出现了刘向、匡衡、谷永等人敢于直言的奏议。当时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托古改制的王莽身上，还有人不满经学中的章句之学和迷信风气，希望恢复先秦儒学的传统。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文风出现明显的变化，代表作家是扬雄。扬雄早年学习司马相如作散体赋，后来认识到这种作品无法发挥讽谏作用而辍笔不为，他曾模仿《周易》而作《太玄》，模仿《论语》而作《法言》，期望以此传名后世。王莽当政时期，他写了诔、颂、箴以及《剧秦美新》等礼制之文，开了东汉礼文创作的先声。扬雄是西汉末年文风转变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四) 东汉前期(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安帝延光四年, 25—125)

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得以发展，国家重新出现了强盛局面。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都有很高的经学造诣，他们比西汉的皇帝更重视文治，更自觉地利用经学来进行教化。《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到了建武五年(29)，建立太学，大批儒士进入其中，修习儒家经典和礼仪。明帝即位后，不仅继续扶持经学，而且身体力行，大力弘扬礼乐教化。《后汉书·礼仪志》载：“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礼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后汉书》中的《儒林列传》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